

文玩
品
鉴赏

玺印

邓
京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玺 印

凉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玺印 / 邓京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4

(文玩品鉴)

ISBN 978—7—5330—2702—5

I. 玺… II. 邓… III. 古印 (考古) — 鉴赏 — 中国

IV. K8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0670号

文玩品鉴

玺 印

策 划: 王 恺

责任编辑: 王 妍

装帧设计: 包晓栋 王宏博

资料编辑: 王 铮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82098268 传真: (0531)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6193019 86193028

制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32开6印张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文玩品鉴》序

现在的收藏类图书市场，正处在一个汗牛充栋的时代、一个知识炒作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鱼龙纷繁、溷浊你我的时代。

这部《文玩品鉴》丛书的选题初衷，就是为了避开这种过于集中的有关鉴定知识的出版浪潮，从更为人性化、休闲化、实用化这几个方面入手，让收藏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中，享受着鉴定知识带来的知识获取和占有的快感。如果真的是这样，这部《文玩品鉴》的策划、编辑就算大功告成；如果暂时尚未达到这样的技术要求，《文玩品鉴》的后续选题将会后来居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出版目标。

收藏目的、收藏方法的不同，本身就导致了认识上的不同，可谓见仁见智。但总的来说，不外乎沿着两条轨迹平行发展：

一是投资类型的收藏。在这个范畴之内的收藏家，基本上都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资金支持，他们所展示的藏品，一般以热点艺术品为主，价位峰值在和者盖寡的区域之内。投资的目的一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再是欣赏藏品外观所表达出的珍贵与豪华。

二是普通类型的收藏。这里涵盖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收藏投资与收藏消费，前者的利润获取手段是低进高出，凭的是眼力；后者则力图通过对真品的收藏，发掘、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史外之史、趣外之趣，从而达到研究与欣赏的收藏目的。他们与投资类型收藏者的猎取目标有着较为明显的错层：前者玩的是经济实力，后者玩的是眼力；前者展示的是靓丽，后者

欣赏的是内涵；前者仰仗的是鉴定专家的鉴定能力，而后者，则是以书为伍，寄希望于白纸黑字对其的忠诚。

《文玩品鉴》丛书的读者对象，就是这种普通类型的收藏者。因为，这些读者很少能请到鉴定家为他们掌眼，他们的收藏决心主要受到对即将入藏器物的理解和欣赏程度的制约，这些带有主观审美的取舍，还是要依靠收藏者自己的综合判断来完成。而对于真伪的判定，则视每个人的鉴定方法、鉴定经历和鉴定悟性的不同而不同。他们要求得到的帮助，一方面是鉴定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欣赏的提示。《文玩品鉴》就是从“品”与“鉴”的视角上，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和体会。

必须一提的是，《文玩品鉴》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来自文物工作的第一线，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中国艺术品的鉴定，从来都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要的传递方法，重感悟而轻理论。因此，在书中一些语言的直观表达上，往往不如一掂、一敲、一观望来得痛快明白。中国有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成败在个人”，读者如能有效地将书中传递出的每一点信息，成功地转移为鉴定理性中的潜意识而加以应用，那么，这套书的编写目的就达到了。

目录

001	概 述
007	第一章 古 玺
015	第二章 秦 印
021	第三章 汉 印
041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印
053	第五章 隋唐印
061	第六章 宋元印
075	第七章 流派印
109	第八章 印章材料
153	第九章 印章辨伪
165	第十章 石材的辨析
179	第十一章 收藏和投资

概述



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执政所持信也。”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此作出进一步注释，曰：“凡有官所者皆曰执政，其所持之节信曰印。”应该说这两段文字告知的解释是一致的，即印章在当时社会是掌权者所持的一种职务凭证，是身份与地位的凭信。

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可以明确地看出，印章起源于政治，是政治对职务权力授予的一种凭信。但是，在考古界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印章应该起源于经济，是源于经济上的需要，即是先用于经济上，之后才被用到政治上。有下面的历史文献可资参考：

《周礼·地官·司市》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

《周礼·地官·掌节》记载：“货贿用玺节。”

《周礼·秋官·职金》记载：“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

《释名》对印章的起源作出解释：“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

从以上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印章的最早应用，应该是作为货物流通时用的封物凭证，而且，从目前发现封泥上钤盖的印记分析、考证，印章的起源应该先用于经济，而后用于政治。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印章起源于实用，作为凭信的象征是毋庸置疑的。

印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也有不同的争论。马衡在其著作《谈刻印》中说：

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周礼》虽有玺节之说，但其书绝非周公所作。春秋时始有玺书，至战国时而盛行。

唐朝杜佑在其所著《通典》中说：

三代之制，人民皆以金玉为印。

杜佑所指的“三代”就是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个朝代。上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商玺”出现，相传这三方古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因出土的年代层不明，学术界对此有争议。1998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遗址范围内，考古发掘到一枚殷墟铜纽玺，印面为兽面纹饰。这一考古发现，印证了印章的起源应该是“商代”之事。

商代距今已经有3500多年历史，也就是说印章的使用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发展史了。在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因为参与制作印章的人数众多，使用印章人数的浩大，必然是印章的内容不一样，形式不统一，工艺不一致。也正是因为众多的不统一，致使印章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呈现出风貌各异。

从年代看，秦小玺、汉官印、魏晋将军印、唐宋九叠印、元花押、明代文人印，每一方印章都烙有时代的印记，不同时代则反映出各不相同的工艺水平，每一次的变化都反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工艺和新的材料，这变化既是后人对印章历史断代的依据，也是鉴定印章真伪的标准。

印章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都会反映在印章的制作工艺上。中国拥有青铜器生产制造的技术

非常早，可以说，最早的印章实际就是最小的青铜器。古代印章的制作，是由专门负责造印的印工制造，印工根据官府对每一级别官员配备印章标准，制造不同大小、不同钮制、不同材质的印章。玺印的制造方法大多为模铸(主要有翻砂、失蜡二法)，也有先铸好印体(印钮、印台)再凿刻印文的。

每一个时代由于生产技术的不同，印章的材质、铸造技术也会有所差异，这给鉴定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虽然在现代技术中，显微观察法、红外光谱分析、X衍射分析热释光等方法，均可以用于对青铜材质的鉴定，但这些复杂的技术手段，对于收藏者个人而言，不具备实际应用的可能。绝大部分收藏者至今仍沿用一看、二摸、三比较的传统方法对收藏品进行鉴定，这就需要收藏者首先具有扎实的观察能力，然后才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积累经验。因此说到各大博物馆观看实物，是增强辨别力最有效，最基础的途径。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或者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最早的印章，应该出自于战国，虽有专家论证商代即有印章，但至今只发现了四方，其中三方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收藏。商代印章存世数量过少，显然是影响时间断代的因素之一。而战国、两汉的官印和私印数量相对较多，尤以汉代印章的存世数量为最，这也是市场上经常能够遇到，拍卖品中经常能够看到的重要因素。

唐代的印章稀少，即使是博物馆的收藏，

也是数量不多。这与当时官印在使用和管理制度的改变有关。从唐代开始，取消了印章随葬制度，官员卸任后所颁官印上缴销毁，所以能够传世的不多。

宋代沿袭唐代的用印制度，所以印章不管是官印还是私印，留存于世的印章从数量看，比汉印少得多，但比唐代印章在数量上要明显有所增加，这又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联。

元代，中国疆域南至越南，北至高丽，并远征欧洲，所以元代的官印因此明显增多。私印因贸易的发展而随之发展，押印是元代私印的最大特征。至今，在我国北方地区还是经常会有新的押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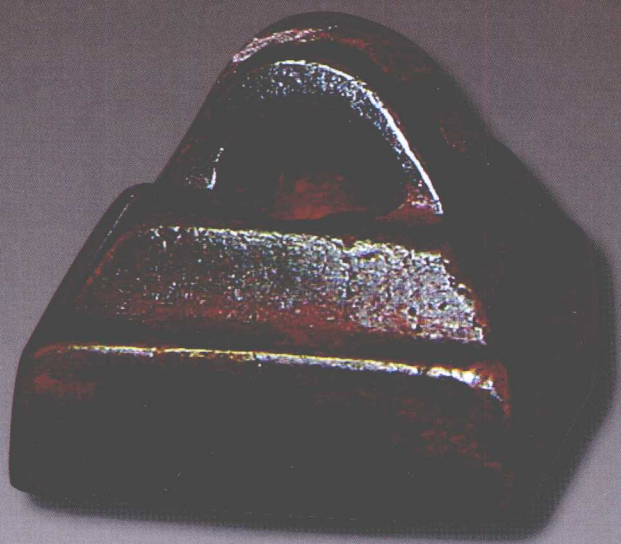
明代和清代官印的使用制度基本沿袭唐代，官员人亡印毁。但明清文人印的兴起，对印章所含艺术价值的欣赏，大大超过了对印章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这种举措其一是扩大印章的数量，其二是使印章从实用转向了艺术，这一时期的印章成为中国印章发展史上又一顶峰。

印章发展到今天，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也只有公章和私印，使用范围也非常有局限性，随着印章实用性的不断减少，印章已不再成为人们日常所需的必备品，印章功能也被归属到文化艺术领域延续它的生命。在这个领域里先贤们已经用智慧和创造力，将印章艺术诠释得淋漓尽致。

收藏印章，先要学会断代辨识，第二步才是收藏鉴赏。从理论到实践是要通过多比较来完成。另外，还要了解若干种最新的和最古老

的做假方法，只有多了解，才能找出真品与赝品中存在的差异，才能知道市场赝品动态，才能去伪存真，才能购买到真品。

第一章
古 玺



第一节 春秋战国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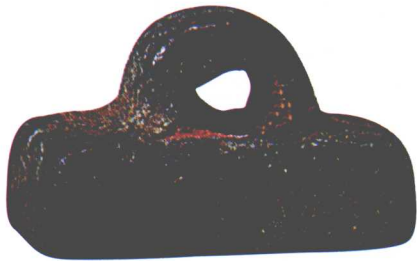
沙孟海先生在《中国印学史》中对印章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明确的阐述：

社会经济发展到春秋时代，铁工具已经开始使用，农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在列国间的广泛发展，作为保证货物安全转徙或存放的信用凭证的印章，必然已经通行。春秋中期季武子用玺书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目前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进入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印章更被大量使用，并且达到了全面发展的程度。

古玺，就是史前人们用的印章，是现代人对先秦以前印章的通称。上面讲了，商代曾发现有四枚，到了春秋时期，玺印的主要用途是“玺书”，即在封泥上压印的封书。这一时期的玺和玺书已普遍使用。《左传》载：“季武子取卣，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就是说，春秋时期就已用玺印来检查文件书札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中，有官玺、私玺、吉语玺、图像玺等。而官玺则是国君授予大臣或官员权力时，颁发的信物和凭证。官府的各种命令、公文，都必须盖有玺印方能有效，若官员丢失了玺印，就等同丢了官职。这种使国家大小官吏都必须随身佩带与自己的官职项符合的玺印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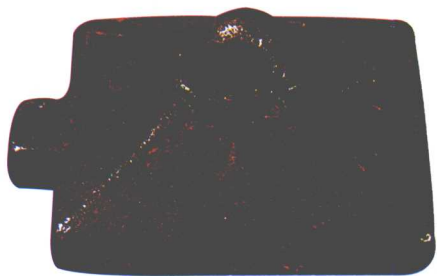
战国时期的官印是根据官职的名称设定来制作，常见的官印有司徒、司马、司空、司

寇。司寇掌管司法；司空掌管工业；司马掌管军队；司徒掌管农业。其中司徒、司马、司空被称为“三事大夫”。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给以一定粮食或赏给黄金、钱币作为俸禄，玺便成为身份的凭证。同时玺符制度形成，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所以，官印是古代官吏任职的凭信，它不仅是职务权力的授予，更是国家权力的标志。



战国 官印

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印形状基本以方形为主，也有个别国家的官印的形状比较特殊，有的呈长方形，也有方形的上方凸出一块，据说原本应该还有一方是方形上方凹进一块，与凸出一方是一对，作用是符节。此说法未有实物印证，故不能成立。



战国 官印

甫易都右司马

铜印。“司马”官名，西周开始设置。在古代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战车不管如何先进，它的机动性还是受地形道路限制。所以，行军时需要保持队形整齐，交战时，严谨的车阵是士兵战胜对方的依托，它可以使勇敢者和怯懦者都不能独自前进或后退。

在战国时期，晋国军队首先特设“司马”一职，专门纠察队列秩序。魏、燕两国也有司马一职，楚国还设有大司马和左右司马三职位。大司马为正职，左、右司马为副职。由此可以判断“甫易都右司马”印是楚国“甫易”县军队长官的官职。

司马在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司徒”、“司马”在历经多年的衍化后，成为了汉字姓氏中的二字复姓。这种官职姓氏化的变迁，应该是源于国家制度的改变，司徒、司马一职的名称不再使用，即而被民间转为姓氏使用。



战国“甫易都右司马”印

易都邑圣口盟之录

战国时期齐国官印。齐国官印最大特征有两点：一是没有边框，二是方形不正，而是在玺印的上部有凸。玺文中的“易都”就是汉代城阳国的阳都，在山东沂水流域。《汉书·地理志》应劭曰：“齐人迁阳，故阳国是。”

春秋战国，官制虽承袭西周，但各国之间略有变化，大体还是统一的。比如：官印在材质上大都用铜，很少有用银、玉等材料。尺寸

约在2.5至3厘米见方，印钮多鼻钮，印台有1至3个不等。印面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划细如毫发，制造方法都出于铸造，印面略小。而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印面比朱文官印稍大。战国时期不论官印、私印都不叫“印”，而称为“玺”。这个字在秦以前尊卑通用，官、私印均可称“玺”。战国时期的官印大都用于封检所用，盖在封泥上面。为了铃盖字迹



战国 “易都邑圣口盟之鈐” 印

清晰，便于识别，印面多数为阴文。

春秋战国时的官印，由于各国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反映在玺印中的文字也不尽相同。文字之奇诡难辨是这一时期玺印文字最大特征。